

郭沫若研究丛书

郭沫若 与 中西文化撞击

税海模 著

東方出版社

16895 C 73

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

税海模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税海模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1

(郭沫若研究丛书)

ISBN 978-7-5060-3335-0

I. 郭... II. 税... III. 郭沫若(1892~1978)-思想评论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0824 号

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

GUOMORUO YU ZHONGXI WENHUA ZHUANGJI

税海模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40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978-7-5060-3335-0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郭沫若研究丛书》总序

杨胜宽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横跨多学科的文化大家；而且，他“亦学亦政”，其后期还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去世后，邓小平赞誉他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文化旗帜。

鲁迅与郭沫若堪称现代中国文化“天幕”中的双子星座，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某种意义上，郭沫若的潜在研究价值甚至有可能超过鲁迅。

这是因为，首先，郭沫若涉足的学术领域比鲁迅更为广博。除文学之外，他还兼治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而且均成绩斐然，卓然成家。鲁迅和郭沫若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各有千秋，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只不过由于郭沫若的治学范围太宽，致使多数专业知识单一的研究者像瞎子摸象似的，仅能领受其部分华章，而难以感知其整体风采。

其次，郭沫若比鲁迅多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 40 年历史风云，而且他是与政治联系得最紧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多次从戎、从政，他“改造世界”的兴趣远远大于“解释世界”。研究他，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现代中国复杂纷纭的历史剪影。郭沫若留下的上千万字的著述，都是他建构、阐释、宣传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记录，凭借它们作为“以文证史”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一个“郭沫若与 20 世纪中国”的大课题。

再次，郭沫若与鲁迅各有不同的文化个性。如果说鲁迅身上更多的具有值得知识分子效法的、让人肃然起敬的“典范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典范性与典型性的统一”。如果说鲁迅身上更多的具有批判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如果说鲁迅身上更

多的表现为“独立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独立性与顺应性的统一”。鲁迅与郭沫若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文化个性，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一生主要生活在体制外，郭沫若后期则是体制中人。事实上，郭沫若后期的思想文字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身上的典型性、建设性和顺应性，其实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感召下，自觉地向郭沫若看齐。所以，可以把郭沫若看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研究他，不仅可以大致窥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而且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走向未来，如何进行精神重建，均不乏启迪意义。

郭沫若身上的时代印记是极为鲜明的，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造就了郭沫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们不仅丰富了郭沫若研究的内涵，同时也使郭沫若研究相当地具有挑战性。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郭沫若研究明显落后于鲁迅研究。作为郭老故里的专业郭沫若研究机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深化郭沫若研究，拓展郭沫若研究，组织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全国郭沫若研究专家，围绕中心重点课题开展研究，计划编辑、出版这套“郭沫若研究丛书”，以此对郭沫若研究尽一份学术职责。

背着“十字架”的思考(自序)

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有位著名学者,在一篇为人作序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意思:在“文化热”中许多人都喜欢宏观地、抽象地大谈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西方文化怎样……;其实,与其大家都写这一类文章,倒不如有一些人选一些具体论题,进行实证的文化研究。

受这番话的启发,我决定选择郭沫若作为学术“标本”,进行文化专题研究。我作这个选择,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郭沫若著述甚丰,材料较多,而且他喜欢谈论自己——单是他未写完的几大卷《沫若自传》就有上百万字,研究他在材料收集上相对要容易一些。

其次,郭沫若一生涉猎甚广,他的精神创造横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多个学科;他的人生活动更涉及到政治、军事、科学、外交等多个领域;从“五四”开始,他就挺立风口浪尖,是时代的弄潮儿。他和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有相当的交往。研究他,几乎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 20 世纪中国风云的一多半的缩影。

再次,诗人郭沫若是一个深受时代影响的性情中人,时代的复杂性在他身上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如果说鲁迅更多的让人钦敬,让人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的话;那么,郭沫若则更亲和一些——因为,他身上也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换句话说,如果鲁迅身上更多的是值得人们效法的典范性的话,那么郭沫若则可以说是典范性与典型性的综合。这样,研究他就可以大致窥见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人生选择和心路历程。

我关于郭沫若的文化专题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是出版于 1992 年的《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这本书论证了郭沫若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一般人

心目中是多么的“先锋”和“激进”，但是他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却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塑造。

在《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的“后记”中，我大致说过我的主要想法：“郭老学贯中西，他光辉的一生从清末贯穿到新时期，在他身上汇集着中西文化相互撞击、交融的诸多正、反经验，很有研究价值。由此我计划写两本书：一本《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将郭沫若作为‘中国人’的一个典型来看待，静态地考察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佛家文化……的深层联系，用以证明不管我们是否自觉与乐意，其实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诸如观念模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情感态度……等，都早已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作为‘中国人’，我们除了接受这一客观事实而外，别无选择。我们所能作的和所要作的，都只是认真地辨析传统文化中的芜菁，去芜存菁，促使其创造性地转化；接下来，如果可能，我还想写一本《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用以勾勒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郭沫若以不同方式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动态轨迹，以期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以为我们走向未来借鉴。”

从1992年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这本《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总算写出来了。为什么这本小书会拖这么长的时间呢？主要原因是，我始终拿不准“西方文化”这个概念，究竟应该有哪些内涵？虽然泛泛而谈西方文化的文字不少，然而潜心梳理、科学界定、并具体论证其内涵的论著却少而又少。多年过去了，自己虽然也写过一些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方面的文章，但始终底气不足，不敢动笔写这本专著。直到新世纪初，读了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世涛主编的一套丛书《知识分子立场》，才打开了思路。这套丛书共三本，收录了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三次论争中的主要文章，分别编为：（一）《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二）《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三）《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读了这三本书中的论争文章，我豁然开朗，认识到：所谓中西文化撞击，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它应该主要是指西方

的一些主要文化思潮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内外激荡起强烈的反响,并且在中国社会中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甚至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人生轨迹。同样的道理,论说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其实是要求我们:具体地梳理郭沫若曾经与哪些影响过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文化思潮发生过怎样的一些关联与纠葛。这里的所谓关联与纠葛,主要是指郭沫若对这些西方文化思潮采取了诸如认同、吸纳、景从、改造、批判、抗拒……等不同的态度、方式,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或“应对”。此外,还应该回答因为采取了这些不同的应对方式,最后怎样地影响、改变了郭沫若的人生。然后,再思考其中留下了哪些启示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样一想,我感到很兴奋,多年的思想困扰终于解开,全书的基本框架就这样立起来了。

接下来,便开始收集各种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西方文化思潮的资料。然后,思考,申报课题,立项,再思考,写作……。

我以为无论能力大小,每个专业知识分子都应该有一种传承人类文明、光大人类文明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即使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终其一生也无所作为;但是这种价值取向,却是不能没有的。即是说,对此至少要有一种“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憧憬与心仪。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精神家园的守夜人。正是这样的原因,世纪之交,才会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著书作文,回首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反思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从这样的角度看,专业知识分子的著书立说写论文,只不过是他们承传人类文明、光大人类文明、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是他们对于时代的一种发言和与学术界的一种精神对话。在他们的学理性的专业思考和学术言说中,应该蕴涵着他们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以及他们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因为蕴涵着生命体验、人生感悟和终极关怀,所以他们的论著才是言之有物的;因为是学理性的专业思考和学术言说,他对时代的发言和与学术界的精神对话才是负责任的。

我已经60岁开外了。仿照苏询的话来说,是已经到了“不必写书,亦不必不写书”的年龄;如果要写,就应该写“言之有物”的书,而不必写那些可有

可无的文字泡沫。

聊以自慰的是,对于本书的写作,我是认真负责的。有这样一个机会,集中地在中西文化撞击的理论框架下思考文化大家郭沫若,确实让我获益不少。这正如王元化所说那样,只有背着“十字架”思考,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现代中国——他所说的“十字架”乃是对中西文化撞击、交融的形象比喻:“十字架”中的那“一竖”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那“一横”则代表西方文化。

本书正是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十字架”理论框架下,分别从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郭沫若与民族主义、郭沫若与自由主义、郭沫若与社会主义、郭沫若与民粹主义、郭沫若与西方民主思想、郭沫若与西方科学思想、郭沫若与西方法文化、郭沫若与西方人文精神、郭沫若与西方文学观念、郭沫若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郭沫若与现代性、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等论题——切入,条分缕析地审视、梳理、辨析、反思郭沫若的百年人生道路……。在这一学术的审视、梳理、辨析、反思中,让人亦喜亦忧,既欣慰又沉重,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麻……,什么味道都有,思绪万千,感慨多多。

我的一个主要感慨是,郭沫若是一个因为历史局限而未能尽才的文化大家,他的遗憾主要是一种时代的遗憾。王富仁先生这样概括鲁迅与一般知识分子的区别:“鲁迅的每一个话语就是一个实践,他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化实践,他在坚持着什么,他在攻击着什么,他在张扬着什么,他是用实践去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话语的符号,他不是一个话语的游戏,而他的行动也是一种话语。”^①也就是说,鲁迅与一般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要区别,即在于他的每一个言说,都是在尽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都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在独立地思考本土社会的“真问题”,都是一种参与时代对话、参与社会讨论的自由言说;而不是像许多学院派知识分子是因为职业、职称或课题的需要,不得不为完成任务、为“交差”而写作,以获得或保持种种现实利益。不管人们对郭沫若有怎样的非议与贬斥,我以为,至少在建国前,郭沫若与鲁迅在本质上是相同或相近的,即当时他们都主要是在以各自的专业知识,真诚地思考、言说

^① 王富仁:《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第86页。

本土社会的现实问题,他们的整体思路是专注于这些思考与言说是否真实,是否合理,而不太考虑这样的思考与言说是否对自己有利。在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文化旗帜。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郭沫若的这种独立、自由的思考与言说在建国后未能继续下去,致使其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均长才未尽,留下无尽的遗憾。

我的另一个主要感慨是,郭沫若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历史存在,在他身上聚集了各种矛盾。评说他时,需要注意把握其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很容易将其简单化而失之偏颇。有一种说法认为:郭沫若是“御用文人”,他“进退行止的原则”均“是个人利益”。其实,建国前郭沫若困顿了半生,蒋介石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多次拉拢他、收买他,他分明是有富贵的机会的,却自觉地躲避开了,而主动选择了相反的另一条路:起义、被通缉、流亡、被监视、困厄!这哪里是什么以个人利益决定进退行止呢?1925年在与孤军派的论争中,郭沫若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们知道搞革命的人有许多是搞掉了自己的脑袋子,有许多至少也是亡了二三十年的命的。所以现在要在私产的国度里实行共产革命的人,失掉脑袋子的事情就算被他免掉呢,这二三十年的命是不能不让他亡的呀!自己的颈子上顶着一个替别人家建功立业的脑袋子,还要去亡二三十年的命,这又何苦来哟?人生只有这几十寒暑,养养儿来防防老,积积谷来防防饥,也就乐得马马虎虎地过去,何苦要把自己的脑袋子来作玩,弄得个妻离子散呢?”^①然而,确乎郭沫若竟然“明知故犯”地“把自己的脑袋子来作玩”,偏偏“要在私产的国度里实行共产革命”!而且,一语成谶。三年后,他便因为“实行共产革命”,果然受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不得不“自己的颈子上顶着一个替别人家建功立业的脑袋子,还要去亡”“十年的命”,到头来“弄得个妻离子散”!其后,到40年代中期,不知吸取教训的他,又与闻一多、李公朴为伍,走在国统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前列,不只一次挨国民党特务的打!须知:建国前郭沫若的政治激进身份,是有杀头坐牢的政治风险的!如果“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的话,是绝对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23页。

不会去做这种“傻事”的。做这种“傻事”的,只能是那些不大顾及客观现实条件的革命诗人和理想主义者。

我的再一个主要感慨是,幸或者不幸,郭沫若正是这样一个长于审美想象而不大顾及客观现实条件的革命诗人和理想主义者。革命诗人和理想主义者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长于审美想象而不屑于细致地观察客观现实,而且由于对理想过于执着,常常不惜以主观想象来替代客观现实,个别时候甚至表现出某种自我神化的倾向。比如,在《女神》中,郭沫若由于太钟情于理想,而希望自我和宇宙都能够如凤凰浴火重生一般,瞬间即变得光明、华美、新鲜……,尽善尽美;他甚至在想象中感觉到自己仿佛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顶天立地的巨人,正“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又仿佛是一只“天狗”,能够一口把太阳、月亮、甚至整个宇宙吞噬掉!难怪郭沫若会认同“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的诗学观念。^①而他对泛神论的极端解释是:“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②这实际上是在想象中将自己提升到本体高度,想象自己乃是无所不能的“神”!如果只是写写诗,而且止于写写诗,这种诗化浪漫想象固然非常美妙。然而,郭沫若却将这种诗化思维方式,扩展到一般认识论。他想象人类已经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现在只消利用这些规律就可以自由地变革社会、改造社会。1926年他在与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即说:“我们随智识上的进步得以发见此因果律而生出自觉,最后是更得以支配而利用之。有意识地有目的地使‘必然’的事物转化为‘当然’,这是我们人类所能办到的事。”^③1930年他在《我们的文化》中进一步说:“宇宙的内部整个是一个不息的斗争,而斗争的轨迹便是进化。我们的生活便是本着宇宙的运行而促进人类的进化。……在飞机已经发明了的时候,……我们要驾起飞机追赶。”^④1939年他在《青年化,永远青年化》中说:“一切自然现象的运行都是呈着波状曲线的,便是有上行的轨迹,达到一定的高峰后便要次第的下行。但加以人为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23页。

②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311页。

③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49页。

④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82,83页。

的努力,这种自然的运行可以使它生出极度的变化,便是上行的轨迹,我们可以使它上行到无止境的高度,或者达到了一定的最高峰时,我们可以使它保持着这一定的最高水准,永远不使它下降。这便是人类的神力足以克服自然力的最高准度,也便是人类文化所应当企及的理想的究竟。”^①郭沫若说这些话的时候,颇有一种“我即是神”的自信:在他看来,仿佛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仿佛人类是创世纪的上帝!他公然敢于宣告:“宗教家所仰望的天国不必在天上去求,原是在这地上可以建设的。”^②

事实上,郭沫若改造世界的兴趣远远大于解释世界,只要条件许可他都会义无反顾地抛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投入到建设“人间天国”的实践中去。对于习惯于把诗化想象思维方式扩展到一般认识论的郭沫若来说,在“地上建设人间天国”的实际工作,本身就是一部最壮丽的革命史诗!恰好与郭沫若同时代的革命家毛泽东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也“敢叫日月换新天”,也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敬仰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个人崇拜,其实郭沫若和毛泽东在个性气质、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认识上本来就有许多相近、相通、乃至相共鸣之处。现在冷静地回头看去,郭沫若以及当时的中国人是太迷信主观能动性了——当时把人的主观精神称之为“精神原子弹”。在革命的“精神原子弹”的鼓舞、支配下,20世纪50-7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实验。由于时间隔得太近,对于这场伟大实验究竟应该如何评说,现在还看得不大清楚。但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通过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郭沫若与民族主义、郭沫若与自由主义、郭沫若与社会主义、郭沫若与民粹主义、郭沫若与西方民主思想、郭沫若与西方科学思想、郭沫若与西方法文化、郭沫若与西方人文精神、郭沫若与西方文学观念、郭沫若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郭沫若与现代性、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等10多个专题的梳理与考察,我却越来越坚信,无论在郭沫若建国前抑或建国后的话语实践活动中,确确实实有一条内在的“革命思维逻辑”线索清晰可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323页。

②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1页。

辨。也就是说,无论人们认为郭沫若多么善变,或者他本身的前后变化多么巨大,其实在这些变化背后,他的所有“革命话语”都是有学理依据和逻辑支撑的。可以说,正是中西文化撞击的“十字架”文化坐标,潜在地调控、牵引着文化大家郭沫若的主要人生轨迹。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郭沫若“革命话语”中的“革命思维逻辑”在学理上明显地存在着某些局限与不足——这种局限与不足,如果用西方现代性理论话语来表述,则主要是郭沫若坠入了迷信人类理性万能的“理性神话陷阱”,太相信“人定胜天”,太自信了。由于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过于曲折坎坷,由于郭沫若超越西方的渴望过于热切、急躁,致使本书在“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题目下展开的10多个论题中,无论就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而言,差不多都会于冷静、知性的考察、梳理中,引发发出一些沉甸甸的思考来。

当然,由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不可能是一个只认学理逻辑的老学究和书呆子。人作为具体的社会现实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某些险恶政治语境的冲击与扭曲,这时郭沫若便会出于自我保护策略权宜地接过当时“绝对正确”的政治口号,写一些应制应景之作,说一些政治套话。再有,还应该看到,郭沫若作为诗人在言说中往往会使用一些夸张的文学修辞手法。因而我直觉地感觉到,在郭沫若的革命话语中存在着思维逻辑、诗化想象和语境策略三种变量,三者之间具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函数关系。如果有人愿意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写一部郭沫若起伏微妙的心灵评传,有可能会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无论是外在的社会现实,抑或内在的心灵世界,都是无比复杂的。这正像苏轼“咏庐山”诗所说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行走在路上的人,是永远看不清未来的前途的,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很多。连睿智如郭沫若尚且掉进了迷信理性神话的现代性陷阱,何况我们这些平庸之辈呢!然而,唯其如此,我们更要在人生道路上,一边脚踏实地地行走,一边瞻前顾后地思索。本书即是我背着“十字架”——借助中西文化撞击理论视角,一边行走(阅读、学习)、一边思考文化大家郭沫若的一份记录。其中不仅有我的些许感悟,还有我的一些困惑。

我思故我在。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只有当我们在思考过程中与感悟和困惑同在时,才能够更真实地感到自己的存在。当然,本书的理论范式主要是一种文化的“挑战—应对”模式。我知道,这种文化“挑战—应对”模式,已经受到学术界的一些批评。我之所以依然用这种理论范式来构思全书,一是因为“挑战—应对”模式本来就是人类面对自然、面对社会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二是任何一种学术范式都是有自己的盲区、盲点的。可能比较现实的办法,乃是应该有自知之明,自知其长其短,而自觉地扬长补短。本书的“扬长”,即是自觉地将西方文化细分为 10 余种文化思潮,一一梳理郭沫若和它们之间的关联与纠葛,并分别思考郭沫若应对这些文化思潮的得失及正反经验。然后再用三章,从方法论上反思郭沫若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具体方式及其留下来的启迪与困惑。本书的“补短”,则是借鉴其他文化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学科建设高度对郭沫若研究作一种整体性的超越性反思——这,便是与本书联系得并不那么紧密的“跋语”。

另外,这本书叫《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但是主要谈的却是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对郭沫若的冲击以及郭沫若的回应,对中国文化谈得不多。严格讲来,这个书名并不是很确切。正好我 10 多年前出版的那本《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出得早,印得少,早已买不到了,由于不断有朋友索要这本书,我自己已将其复印过多次,现在作为附录一并印行,这似乎对于二者都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补救方式。

目 录

《郭沫若研究丛书》总序	1
背着“十字架”的思考(自序)	1
第一章 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	1
第二章 郭沫若与民族主义	18
第三章 郭沫若与自由主义	32
第四章 郭沫若与社会主义	48
第五章 郭沫若与民粹主义	64
第六章 郭沫若与西方民主思想	79
第七章 郭沫若与西方科学思想	94
第八章 郭沫若与西方法治文化	111
第九章 郭沫若与西方人文精神	126
第十章 郭沫若与西方文学观念	141
第十一章 郭沫若与基督教文化精神	157
第十二章 郭沫若与西方现代性	172
第十三章 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	189
第十四章 郭沫若建国前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应对	206
第十五章 郭沫若建国后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应对	225
第十六章 郭沫若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启示与困惑	252
跋语 郭沫若研究的超越性反思	268

附录: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

导 论 在郭沫若心灵深处·····	285
“五四”前的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	295
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307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儒家文化·····	319
郭沫若与道家文化·····	332
郭沫若与墨家文化·····	345
郭沫若与法家文化·····	355
郭沫若与中国佛家文化·····	367
郭沫若与乐山乡土文化·····	379
余 论 郭沫若留下的文化启示·····	393
后记·····	405

第一章 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进化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之一。进化论最初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学说引进中国,既而带来一种线性时间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迥异于前的确信历史进步的世界观:思想家以之作为基本理论预设,革命家以之作为革命行动理由,人民大众以之作为忍受眼前苦难、坚信未来光明的潜意识根据。实际上,无形之间进化论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

梳理进化论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层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郭沫若可谓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学术“标本”,通过对他的考察,很能说明进化论在多大程度上,怎样左右、制约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模式、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情感态度,怎样规定和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一落千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严复的《天演论》将进化论引进中国,当即洛阳纸贵,“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当头棒喝,令中国士人、学子从大梦中醒来,心惊肉跳不已。

进化论传入中国的积极意义,是它为中华民族的救亡提供了思想激励武器。既然西方列强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中华民族如果再不奋起自强,必然亡国亡种,被“开除球籍”。而且,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念,也为民族振兴提供了胜利的保证。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是循环往复的:所谓“大道周